

晋商研究

(第二辑)

RESEARCH ON JINMERCHANT

山西财经大学晋商研究院 编

晋商精神与山西高等商科教育 ————— 孔祥毅

从新中国六十年金融变迁看经济与金融的关系 —— 洪霞管

清代太平县四大商人家族 — 黄鉴晖 孙长青 宋培进 黄文胜



经济管理出版社

ECONOMY & MANAGEMENT PUBLISHING HOUSE

晋商研究

(第二辑)

山西财经大学晋商研究院 编

RESEARCH ON JINMERCHANT



经济管理出版社
ECONOMY & MANAGEMEN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晋商研究. 第二辑/山西财经大学晋商研究院编. —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5. 1
ISBN 978 - 7 - 5096 - 3633 - 6

I. ①晋… II. ①山… III. ①晋商—研究 IV. ①F7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39470 号

组稿编辑: 宋 娜

责任编辑: 宋 娜

责任印制: 黄章平

责任校对: 超 凡

出版发行: 经济管理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 8 号中雅大厦 A 座 11 层 100038)

网 址: www.E-mp.com.cn

电 话: (010) 51915602

印 刷: 北京晨旭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20mm × 1000mm/16

印 张: 15.5

字 数: 296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096 - 3633 - 6

定 价: 88.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印装错误, 由本社读者服务部负责调换。

联系地址: 北京阜外月坛北小街 2 号

电话: (010) 68022974 邮编: 100836

主 办：山西财经大学

承 办：山西财经大学晋商研究院

学术顾问：孔祥毅 张正明

编 委：樊云慧 张亚兰 孙长青 乔 南 陶宏伟

主 编：樊云慧

编 辑：薛秀艳 侯海燕

地 址：山西省太原市坞城路 696 号

山西财经大学晋商研究院

邮政编码：030006

电子信箱：jinshangyanjiuyuan@163.com

联系电话：0351 - 7666747

出版说明

山西是中国商业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山西商人是中国经济史上的劲旅，明清晋商更是因创造了货通天下、汇通天下的历史奇迹而成为当时中国十大商帮中的巨擘。历代晋商及其成就的辉煌事业虽然早已消逝，但他们从崛起到兴盛、由兴盛而衰落的史实却蕴藏着丰富而绚烂的知识瑰宝，在经济、管理、社会、艺术、法律等多学科领域都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在社会经济制度变迁的过程中，人的行为必然会受到历史传统的影响，其“路径依赖”原理决定了当代中国商人精神对明清商业精神的传承。一个理性社会的形成，需要思想家和政府的引导，更需要公共知识分子和社会媒体向大众传播。研究晋商，弘扬晋商精神、中国商人精神是当今建设市场经济与和谐社会的重要资本，同时也是当代社会研究晋商的现实意义所在。山西财经大学作为从晋商大院走出的专门商科院校，责无旁贷地担当起了这一历史重任，在 60 多年的办学历程中，山西财经大学积极地、有组织地开展晋商研究工作已有 56 年的历史。

为了及时反映国内外晋商研究的成果，早在 1982 年，原山西财经学院（山西财经大学的前身）就创办了专门刊物《山西票号研究集》。1984 年，《山西票号研究集》第二辑出版。2007 年，学校投入资金，委托晋商研究院将原有的专门刊物《山西票号研究集》更名为《晋商研究》，作为院刊，并于 2008 年 1 月出版第一辑。本次出版的是《晋商研究》第二辑。

《晋商研究》是专门反映晋商与经济史、票号与金融史、晋商文化与商业伦理、中国商业文明流变、商帮史等方面研究成果的学术刊物。根据来稿内容，《晋商研究》第二辑设特稿、兴衰演替、商业文化、商贸合作、金融票号、经营管理、学生园地等栏目，为学界同人及商界、政界关心晋商和历史的人士竭诚服务。

山西财经大学晋商研究院

《晋商研究》编辑部

目 录

特 稿

- 晋商精神与山西高等商科教育 孔祥毅 (1)
- 从新中国六十年金融变迁看经济与金融的关系 洪葭管 (9)
- 清代太平县四大商人家族 黄鉴晖 孙长青 宋培进 黄文胜 (19)

兴衰演替

- 论开中盐法的演变与明中后期边镇纳粮体制的瓦解
——明政府放权让利与利益集团垄断盐业市场的考察 高春平 (26)
- 清末潞绸产业衰落原因的几点考证 韩 玮 程 琦 (46)
- 晋商商帮兴替的历史轨迹 薛秀艳 (59)

商业文化

- 明清晋商与中国商业文明 张 舒 张正明 (72)
- 儒商风骨，德信为本
——晋商文化中的正能量 刘海鸿 郭玉兰 (78)

商贸合作

- 晋商在茶路贸易中的秘密 张亚兰 梁 杉 张 鸿 (86)
- 论明清山陕商人跨区域经济联合的动力及其对区域
经济一体化的借鉴 王俊霞 李 刚 (97)

金融票号

- 东西方纸币制度比较研究 周旭峰 (113)
- 明清时期的金融信用大发展 李勇五 (123)
- 票号兴起、钱庄扩张与近代中国货币的关系 杨志勇 (130)

经营管理

- “人际资本”在晋商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及当代意义 乔 南 (142)
- 晋商非报告货币折算中的会计稳健主义 张丽云 陈 旭 郭 睿 (149)

学生园地

- 明清山西民间金融的现代法治启示 赵 亮 赵 劲 (162)
- 中国文化与金融发展的关系探讨 郭志华 (171)
- 阎锡山货币金融理论实证
——《山西文水县民国纸币》研究 张 奕 (178)
- 从辽王朝货币制度看中华民族融合发展的历史 李 芳 (206)
- 茶路为媒, 开辟晋商旅游文化新篇章 郭峻峰 谢依然 (212)

晋商精神与山西高等商科教育

孔祥毅*

商人和商业，起始于商地。对此，考古学者认为中国的商品交易起源于商地的一个原始部落。但一说商地在今河南省商丘，一说在今山西省垣曲亳城镇。该部落始祖名契，是黄帝的第四代孙，曾跟随大禹治水，为老百姓做了许多好事，功业昭著，舜帝将其封于亳。契的六世孙王亥（名振）继任为商部落首领后，发明了牛车，驯服牛用以挽车，是商王朝开国帝王成汤的七世祖。学者胡厚宣在《殷商史》中说，王亥是中国畜牧业的创始人，“随着农业与畜牧业的发展，随之而来的就是商业的产生。随着商部落经济实力的增强与剩余农产品及畜牧产品数量的增加，王亥便开始了一项前所未有的事业，这就是开始从事商业贸易活动”^①。王亥是中国商业史上“肇牵车牛远服贾”最早的商人，他所开创的畜牧业和开始的商业贸易活动给当时的商部落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商部落迅速发展壮大起来。公元前1551年，王亥的六世孙汤，率商部落灭夏，史称商朝，商多次迁都，最后定都于殷，商又称为殷，而商人又称为殷人。周灭商以后，因殷商之人善于从事商品贸易，周公（姬旦）便要求商之遗民继续做买卖。后来，人们将从事这种商品交易活动的人称为商人，这一行业称为商业。

山西上古称唐，后改称晋。晋商，是山西商人的简称。因为山西地处中国农耕与游牧业的接壤地区，被万里长城隔开，从西汉到清代，长城被称为边墙，边墙两侧的民族贸易称作“边贸”。由于地理的原因，从事边贸是山西人的传统。明清时期，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也就是商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晋商、徽商、潮商、陕商、鲁商、闽商、洞庭商、宁波商、江右商、龙游商各大商帮竞争激烈，晋商依靠优越的地理条件，抓住历史机遇，很快在财富积累、商路开拓、国际贸易、企业组织、经营管理、金融创新、商业技术、商业伦理、商业文化等

* 孔祥毅，山西阳城人，山西财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特贴专家，商业部部级优秀专家，中国商业史学会名誉会长，全国高等财经教育研究会顾问，中国金融学会常务理事，山西省晋商文化基金会理事长，原山西财经学院院长，山西财经大学党委书记。

① 王瑞平：《王亥与中国商业贸易的肇端》，《中国经济史论坛》2004年6月。

方面获得巨大成功，并逐步创造出了自己独特的营业策略、管理思想、理财理念、企业文化、价值观念、商业伦理等，成为中国商界最具活力的一支商帮，晋商之名也因之享誉海内外。

一、晋商精神

晋商精神是晋人从事商业活动的一种相对稳定的思想方法、行为范式和价值观念。表现为重商立业的人生观、诚信义利的价值观、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同舟共济的协调思想。

重商立业的人生观。中国主流社会长期以来以“士、农、工、商”排序，但宋元以来，山西人逐渐形成了重商理念。清雍正皇帝在《朱批谕旨》中写道：“山右大约商贾居首，其次者尤肯力农，再次者谋入营伍，最下者方令读书。”^①明清时期，山西民间的重商观念，主要表现为以商致财、用财守本的立业思想。晋中民间流着这样的顺口溜：“生子有才可作商，不羨七品空堂皇。好好写字打算盘，将来住入茶票庄。”

诚信义利的价值观。在义和利的关系上，晋商认为义和利是相通相济的，坚持见利思义，先义后利，以义制利。也就是说，只要讲义，讲信用，朋友就多，生意就容易做，利也就在其中了。卫聚贤在《山西票号史》一书中说：“重信义，除虚伪，节情欲，敦品行，贵忠诚，鄙利己，奉博爱，薄嫉恨，喜辛苦，戒奢华，他如恒心、通达、守分、和婉、正直、宽大、刚勇、贤明，皆为一贯之教训。”^②他们推崇“仁中取利真君子，义中求财大丈夫”。

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清康基田在其《晋乘蒐略》一书中写道：“山西土瘠天寒，生物鲜少……太原以南，多服贾远方，或数年不归，非自有余，逐十一也。盖其土之所有，不能给半岁之食，不得不贸迁有无，取给他乡。”^③山西商人的勤劳节俭、艰苦创业、积极进取，同时包含着不断的思想创新、业务创新、技术创新、商号组织制度和管理创新，诸如平色折合^④、以票代银、票据转让、客钱丁卯^⑤、过标清算等，均在实践中做了大量的探索和创新。

同舟共济的协调思想。晋商认为“和气生财”，重视与社会各方面的和谐相处，认守信用的客户为“相与”，凡“相与”者都要善始善终，同舟共济，世代相传。商号号规对东家和掌柜、掌柜和职工、职工上下级、总号和分号、分号和

① 《雍正朱批谕旨》第四十七册，雍正二年五月九日《刘於义奏疏》。

② 卫聚贤：《山西票号史》，重庆说文社，1944年。

③ （清）康基田：《晋乘蒐略》第1卷，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年。

④ 平，天平砝码；色，银两的成色。因为秤平、银色没有国家统一标准，商品交易均按照各地习惯办理，异地商品交易的平色折算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问题。

⑤ 客钱，清代晋商的转账结算办法；丁卯，清代货币商人之间的清算。



分号、本号和他号的关系有明确的规范,要求“各处人位,皆取和衷为贵,在上位者宜宽容爱护,慎勿偏袒;在下位者当体谅自重,得不放肆”,恪守中和之道。

晋商精神的渊源,来自千古传承的唐晋遗风,即久远的经商历程、资源的地理禀赋、和谐的中庸哲学和以商致财、以财守业的立业思想。晋商精神及其所体现出来的文化特点,反映出晋商处人适情,处物适则,处事适理,人和、物义、事中的中和哲学。晋商的中和之道包括:一是不左不右,执两用中,无过不及;二是与人相处,和为贵,诚实守信者可成为“相与”,世代友好;三是权中时变,注意市场与社会信息,预测、识机,随时调整经营策略,守道权变。晋商认为,中为道,和为本,坚持道御经营,和贯始终。诚如晋商谚语:“义是生财道,和是化气丹”、“与人到处无非议,生意之间即是春”、“仁义礼智信信中取利,温良恭俭让让内求财”,表现出执两用中的中和之道、和气生财的理财理念、人本思想的企业文化和竞争合作的群体精神。

清中期以后,一批研究地理学的学者如祁寓藻(1793~1866,山西寿阳人,其父祁韵士是研究西北地理的先驱者)、张穆(1803~1849,山西平定人)、何秋涛(1824~1862,福建光泽人)、徐继畲(1795~1873,山西五台人)等,不仅研究西北、蒙古地理商路,而且研究世界地理,徐继畲说:“欧罗巴诸国,皆善权子母,以商贾为本计,关有税而田无赋。航海贸迁,不辞险远,四海之内,遍设埔头,固由其善于操舟,亦因国计全在于此,不得不尽心力而为之也。”^①并且提出中国借鉴西方经济社会制度的问题。曾任山西巡抚的洋务派人物张之洞、胡聘之等都是商人精神进入主流社会的推动者。这些重商思想进入上层社会的要求,自然地是晋商精神的重要根源。

晋商与晋商精神,养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山西人,从中涌现出了无以计数的大商人,如晋南的亢家、刘家、高家、王家、张家、李家,晋东南的王家、潘家、赵家、陈家,晋中的范家、常家、乔家、渠家、曹家、牛家,晋北的郜家、杨家、秦家等。正因为山西人善于经商理财,明清时期也出现了大批为国家理财的大人物。在明代,为国家管理财政的户部尚书有洪洞人韩文(1440~1526)、太原人王琼(1459~1532)、沁水人李瀚(1453~1533)、阳城人王国光(1512~1594)、榆次人楮鈇(1532~1600)、泽州人张养蒙(?~1605)、蒲州人韩爌(1564~1644)等;在清代,有阳城人陈廷敬(1639~1712)、阳城人田从典(1651~1728)、寿阳人祁寓藻(1793~1866)等;民国时期,有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太谷人孔祥熙;新中国成立后,为新中国管理国家财政金融的大理财家有定襄人薄一波、洪洞人南汉宸、文水人胡景翼、霍县人陈希愈、五台人戎子和等。

^① 徐继畲:《瀛寰志略》卷4。

二、山西早期的商科教育

晋商的核心价值观是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他们认为，恪守仁、义、礼、智、信是和谐社会做人的道德底线。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① 晋商对员工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的训练培育，是通过对员工的推荐制、选拔制、学徒制、薪酬激励制、担保和宗法约束制等进行的。晋商发展史说明，商人的社会教育必不可少。明清时代晋商的基础教育主要是家庭、私塾、义学与书院。

私塾是晋商基础教育的基地，年至九岁入塾，教以《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三种小书，次第读之。十岁开始，次第读《论语》、《大学》、《中庸》、《孟子》，谓之四书。十三岁以上讲授《论语》，其书曰《二论典故》或《二论讲义》，均以白话解释书义，谓之开讲。十三岁以后向专业教育分化：有意于举业者，则续读《诗》、《书》、《礼》、《易》、《礼记》、《春秋》各经及古文辞，时文试帖，初学时文及试帖之摹制，谓之开笔；而有意经商者，于四书之外兼学珠算、《千家诗》、《幼学》、《尺牍》。

走出私塾、书院，十五六岁进入商号，需要经过学徒选拔，然后是学徒训练。学徒阶段的学习内容，包括商人修养、写字、珠算、记账、秤平银色、经营技术与业务。商人修养是第一位，即诚信义利的商业伦理、中和之道的处世哲学、修身正己的心智素养。要求“学生意，要有耳性，有记才，有血色，有活气，此四件万不可少。有耳性者，则听人吩咐教导；有记才者，学问的事就不能忘却了；有血色者，自己就顾廉耻了；有活气者，则有活泼之象，又叫着是个生意脸，且而人人见了欢喜你”；还要求“学生意先要立品行，但行有行品，立有立品，坐有坐品，食有食品，睡有睡品。以上五品，务要端正，方成体统。行者，务必平身垂手，望前看，足而行，如遇尊长，必须逊让，你若獐头鼠目，东张西望，摇膊乱跪，卖呆望蜜，如犯此样，急宜改之；立者，必须挺身而立，沉重端严，不可依墙靠壁，托腮咬指，禁之戒之；坐者，务必平平正正，只坐半椅，鼻须对心，切勿仰坐、偏斜、摇腿、跣足，如犯此形，规矩何在？食者，必从容缓食，箸碗无声，菜须省俭，大可厌者，贫吞抢咽，筷不停留，满碗乱叉……扒于桌子，这样丑态，速速屏去；睡者，贵乎曲膝侧卧，闭目吻口，先睡心后睡目，最忌者瞌睡岔脚，露膊弓膝，多言多语，打呼喷气，一有此坏样，起早除之”。^② 著名书法家徐润弟为侯家书写的一副对联说道：“读书好经商亦好学好便好，创业难守成

^① 《孟子·告子上》。

^② 山西省晋商文化基金会：晋商史料系列丛书·商人读本卷（二）——《商人要录·贸易须知》，中华书局、三晋出版社，2014年。



亦难知难不难。”体现了商士同性，贾儒相通，行贾习儒，都需要修身正己，提高心智素养。

榆次常家重商而不轻学，重学而不轻商，学为经商之才培养基础，商为深学之人提供条件，要求子弟“凡语必忠信”、“凡行必笃敬”、“饮食必慎节”、“字画必楷正”、“容貌必端庄”、“衣冠必肃整”、“步履必安详”、“做事必谋始”、“出言必顾行”。乔家尊师重教，书房中供先师孔子位，并有名家端方书写的“敏德以为行止，本立而可道生”的对联。乔家对教书先生非常挑剔且尊敬，非饱学之士不请，教师回家以轿车接送，主人们一字排开送到大门外，还要目送一程。民国以后，乔家的私塾，不仅读四书五经，还有文史、数理、英语等课程。乔家的子孙中有12名大学生、两位博士、三位硕士，两位留学美国。明代著名蒲州商人王文显一生的体会是：“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善士者引先王之经，而绝货利之径，是故必名而有成。故利以义制，名以清修，各守其业，天之鉴也。如此则子孙必昌，自安而家肥富。”^① 晋商的心智素养，注重儒贾相通观、义利相通观、谋略竞争观、修身正己观、科技应用观、经世致用观的学习修养。

明末清初，傅山、戴廷弼、阎尔梅、阎若璩等全国知名的山西学者与顾炎武、王士禛、屈大均等经常聚会于祁县丹枫阁。丹枫阁为祁县商家戴廷弼所建。他们站在商人立场上，呼吁商人进入主流社会。傅山提出“市井贱夫可以平治天下”的主张，因为商人对商品生产、交换、流通、供求以及财富创造、经营管理最为了解。他说：“何以聚人？曰财。白然贫士难乎有群矣，家国亦然。故讳言财者，自是一教化头骨相耳。常贫贱骄语仁义之人，大容易做也。”^② “生人之有为也，本以富生人。富生人，而治人者乃有为。”^③ 明确提出有为的人关键是创造财富。李贽也说：“不言理财者，决不能平治天下。”^④ 清初山西祁县丹枫阁是北方学术交流的中心，与江苏如皋冒襄的水绘园南北呼应。

1500~1750年欧洲商业革命，经过250年导致欧洲工业化；同时发生的中国商业革命，经过了350年后，才出现了一线工业化的曙光。原因就在于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使得欧洲的神权得以清算，人权得以张扬，科学与民主成为时尚，使欧洲的商业精神、重商主义与市民思想成为社会的主流，导致工业化在欧洲崛起。中国的皇权始终没有得到清算，戊戌变法没有能够像明治维新那样获得成功，中国商人精神始终不能进入社会主流。

① (明)李梦阳：《空同集》卷44，《明故王文显墓志铭》。

② 魏宗禹：《晋阳人文精神》，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年。

③ 傅山：《霜红龕集》卷35。

④ 李贽：《大学评》。

光绪初年山西的一次乡试，试题为西商富华商困的原因。一位举子写道：“良由商学无专门，商律无专条，商会无专责，而中西商情悬绝。”这一回答精彩绝妙。应当说中国的商科教育比西方晚了一些，但是也在缓慢发展。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南洋高等商业学堂（专科）创立，设银行、保险与关税科。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京师大学堂创立，设有商科。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清政府颁布《钦定高等学堂章程》和《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都列有商务学科。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大学堂章程》，规定大学八个学科，其中也含农、工、商、法。商科大学分三门：银行与保险学门、贸易与贩运学门、关税学门。1912年，民国政府颁布《专门学校令》，设法、商等十类；颁布《大学令》，设商、法等学科。1913年，教育部规定大学商科设银行学、保险学、外国贸易学、领事学、关税仓库学、交通学六门。到1948年，全国207所高校中设有商科的大学有80所，商科系科21种，在校生占11.4%。

山西省的商科教育发展在全国并不落后。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山西成立工业专门学堂，两年后改为商业学堂；1912年改为山西公立商业专门学校；1914年金永反对新学，勒令商业学校并入法政专门学校；1916年山西公立商业专门学校恢复；1930年10月山西公立商业专门学校改为山西公立商业专科学校。

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在山西大学设置财经学院。1951年将设在山西太谷的铭贤学院的财税、银行、会计并入山西大学财经学院。1952年将山西大学财经学院并入中国人民大学。1958年将1951年成立的山西省商业干部学校、山西省银行干部学校和1952年成立的山西省财政干部学校、山西省粮食干部学校、山西省合作干部学校合并组建山西财经学院。当年分二年制专修科、一年制进修班和短期轮训班三部，学生1087人。第二年招收四年制本科贸易经济、金融两个专业，后来又增加粮食经济、会计、国民经济计划等五个本科专业。20世纪50年代，高等教育在山西有了长足的发展，至1960年，山西境内高校发展到33所。

山西高等商科教育的发展也确实曲折。1961年按照“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大幅裁并高校，1962年山西省仅有山西大学、太原工学院、山西医学院等6所高校。山西财经学院于1962年改为中专，但很快在1964年恢复招生。1971年初，各大学搬出城市，迁往农村，山西财经学院搬迁到平遥县襄垣镇进行“斗批改”，1971年6月山西省革命委员会财贸组决定撤销财经学院，遣散教职员，留部分教职工组建山西财贸干部学校。1973年8月国务院批准恢复山西财经学院，1978年9月划归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主管，1982年2月改归商业部领导。1985年山西省成立经济管理学院，1997年合并山西财经学院与山西经济管理学院，更名为山西财经大学。几经曲折，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山西



高等商科教育才在改革开放中获得了稳定的发展。目前,在山西数十所高等学校中,设有经济学、管理学及其二级学科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经济史、统计学、财政学、税务学、金融学、保险学、金融工程、投资学、会计学、财务管理学、审计学、企业管理、国际企业管理、市场营销、电子商务、旅游学、国际贸易、产业经济学、经贸英语、经济法、工商管理类等经济管理类数十个专业的本科、专科,在校学生数万人;同时,还有经济学、管理学在读博士、硕士研究生数千人。山西高等商科教育有经济学、管理学学士、硕士、博士授予权,高等商科教育获得了空前繁荣。

三、晋商精神仍然是当代山西高等商科教育思想

19世纪中期后,科技进步使商路改变,晋商失去地利优势;政局动荡与战乱,晋商资产损失惨重;清末,部分晋商疏于审时度势,没抓住机遇适时改革,使晋商在近代社会巨变中走入低潮,晋商精神不再为外人关注。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几年的迅速发展,新晋商正在走遍山西,走向全国,走向世界。三十几年来,新晋商从不起眼的个体户、被人褒贬不一的煤老板等不同渠道,经过原始积累,已经或者正在走向现代化的装备制造、清洁能源、化工材料、电子网络、文化旅游、生态农业等新型产业。民营企业已经登上政治舞台,山西工商业者正在以新晋商的新形象汇入中国新商人群体。一个无城不商、无商不富的时代已经形成。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商人精神、商业伦理正在成为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新焦点。历史上的晋商文化、晋商伦理与处世哲学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其实,形而上学的东西或者竖起来,或者倒下去,都不是一代或者两代人的事情。晋商精神在山西民间仍然微弱地存活着。只要政府确立天地之间人为贵,以民为本,为天地立志,为生民立道,坚持市场调节为主;只要大企业确立独富贵为君子耻,能够大富大红大德,相济于业,互惠互利,并由此建立起我们共同的基本信念、价值取向、企业精神、行为准则,那么仁爱、正义、礼让、理智、诚信的社会环境与和谐发展,就是看得见的目标。晋商精神仍然是当今建设市场经济与和谐社会的社会资本。理性社会的建设,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思想家和政府的引导,需要公共知识分子和社会媒体的传播,需要高等教育的贡献。高等商科教育担负着培育新一代企业家的重任。晋商精神仍然是当代高等商科教育的思想。

作为培养新一代企业家的山西高等商科教育,需要弘扬和传承晋商精神,在教学中,把重商立业、诚信义利、艰苦奋斗、同舟共济贯穿始终,以尧舜关圣等圣哲先辈的思想教育学生,不愧为尧舜关圣之后;更要在教学中发展和创新晋商

精神，赋予晋商精神以新时代的理念与需求，敢于进市场、闯洋场，与省内外、国内外商人交朋友、做生意。让学生明白，在经济转型发展中，从依赖自然资源逐渐转向循环经济业态，延长产业链条，实现资源综合利用，并积极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关心社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以周到的服务、合格的产品、合理的价格服务社会，体现出责任晋商的新形象；新晋商要传承老晋商的诚信，把诚信作为资本，作为市场的通行证，作为企业的命根子和自觉行为，体现出诚信晋商的新形象；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还要以科学、以知识为基础发展自己的事业，推进工艺创新和产品换代，在现代科技支撑中登高望远、正确决策、占领先机，体现出知识晋商的新形象；还要开放眼界、敞开胸怀，以世界眼光和思维，把对外开放与内部发展相结合，积极使家族企业、合伙企业走向现代企业、走向世界，体现出开放晋商的新形象。

现代高等商科教育的课程设置、培养目标，注意了商学理论、科学技术、管理方法，这是现代商人必备的条件和要求，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比较老晋商当年称雄天下最重要的软实力——诚信义利的商业伦理、为人处世的中和之道和修身正己的心智素养，我们的现代商科教育还需要大大加强。现代工商业、金融业与服务业的竞争，已经不再是业务规模和资本数量的竞争，而是软实力的竞争、文化的竞争，软实力关系到一个企业、一个行业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软实力是现代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当然，现代商科教育还需要注意多学科的交叉，关注当年晋商教育不存在的经济学、管理学与法学、数学、工程学、心理学的融合与交叉等边缘科学问题。

用晋商精神培育新一代企业家，是值得研究的课题。

参考文献

- [1] 黄鉴晖：《山西票号史料》，山西经济出版社，1990年。
- [2] 孔祥毅：《金融票号史论》，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年。

从新中国六十年金融变迁看 经济与金融的关系

洪葭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整整六十年。在中国历史上，这六十年是非凡的六十年，中国已经发展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在金融方面，改革开放有了巨大成就，且在国际上获得了一定地位，虽然历经曲折风波，但在关键时刻，总是能起稳定大局、继往开来的作用。回顾六十年来中国金融的变迁，总结经验，汲取历史教训特别是这次美国金融危机的教训，对正确认识和把握当前金融工作的任务与使命，规划未来金融发展，均具有积极意义。

一、新民主主义金融的短暂实践——金融服务经济：三年恢复，五年创业（1949～1957年）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而作为新中国金融事业主体的中国人民银行已于1948年12月1日在老解放区河北省石家庄市成立，同时发行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的成立和人民币的发行标志着中国货币走向统一，新民主主义金融体系正式形成。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几年中，金融方面的许多做法、措施，符合新民主主义经济的要求，从总体上讲是新民主主义金融的短暂实践。

南京国民党政权崩溃撤出大陆前，留下的是一堆烂摊子。抗日战争胜利后，它的中央银行拥有9亿美元，包括600多万两黄金，很快就耗费掉大部分，仅余200多万两黄金。1948年12月1日，又从上海央行库房里把首批黄金200万两运到台北收存，以后又运走57万两^①。留存的备日常业务需要的黄金19.8万两，到1949年5月17日，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又提走19.2万两，中央银行库

* 洪葭管，浙江鄞县人，上海市金融学会副会长，中国金融学会金融史专业委员会主任、研究员，上海财经大学和交通管理学院兼职教授，交通银行咨询委员，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指导教师。该文系作者于2009年所作，发表前未经作者审核。

① 洪葭管：《中央银行史料》，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年。

房里只剩0.5万两黄金和30万银元，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于10天之后接管。

面对陆续解放的各大城市缺粮、缺钱的困难局面，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和各地分支行协同有关经济部门致力于稳定金融物价、制止通货膨胀。

1949年6月初，由于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存在，一些唯利是图的投机分子乘机兴风作浪，掀抬金银价格，使银元、黄金的黑市价成倍上涨。在过去金融中心的上海，投机活动尤为猖獗。经中央批准，上海市委、市军管会果断地作出了取缔银元、黄金、美钞投机活动的决定，于6月10日查封了金银投机的大本营——证券大楼，打击了操纵投机金银黑市的为首分子，使金银黑市价格迅速下降，金银投机活动基本肃清，初步稳定了金融物价，也为巩固、扩大人民币在上海市场的阵地扫除了障碍。

投机分子扰乱金银的活动遭到沉重打击后，又在商品物资上囤积居奇，倒买倒卖。1949年6月下旬到7月下旬，他们知道粮食库存不足，就哄抬粮价，粮价上涨，其他物价也随之上涨。在此时期，由于新解放区不断扩大，老解放区开始恢复生产，生产建设的支出增大，大量资金流到上海采购物资，投机资本遂再次兴风作浪。到11月，上海的工业原料上涨，棉纱、粮食价格猛升，同时影响到其他城市物价上涨，形成一次全国性的物价大波动。面对这种情况，上海市在国家有关部门支持下，大量抛售棉纱、棉布等物资，金融部门加大收紧银根力度，财税和物资部门共同采取措施，抑制涨风。人民银行所有可运用的金融手段中最有力也最有成效的是开办折实储蓄。凡持有人民币者可按人民银行逐日公告的折实单位牌价，折合成折实单位存储，支取时亦按折实单位牌价支付，储户不会因物价上涨而遭受损失。1949年11月16日银行收存的折实储蓄为1120万单位，每一单位牌价为0.1855元（原为旧人民币，已按1万元作1元折合成新人民币）；到翌年2月28日增至4661万单位，每一单位牌价升至0.6546元。这种折实储蓄在物价波动时存储的人就更多，最多时占银行全部储蓄存款总额的91.3%，^①对稳定金融市场、安定居民心理，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50年3月人民银行又开办定活两便储蓄，这种储蓄既有活期之便又有定期之利，存储者十分踊跃。5月下旬，开办保本保值储蓄，储户存入时照货币数额收存，支付时如折实牌价上升，可按折实保值；如折实牌价持平或下降，则可按原存货币保本，并计利息。银行致力于居民储蓄业务的开展，符合《共同纲领》和《宪法》对居民私有财产予以保护的精神。

经过几个有关部门的细密准备，政务院（后来改称国务院）作出《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的重大决策，号召全国经济组织为实现财政收支、

^① 洪葭管：《上海金融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